

自序

《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這部書是我最近五年來在東亞儒學這個領域所做的研究成果的一部份，現在，趁著全書殺青付梓之際，我願就這部書寫作的背景略作說明，以就教於讀者。

中日兩國地緣關係接近，1898 年康有為（1858-1927）詩云：「海水排山到日本」（見宮崎滔天著，啓彥譯：《三十三年之夢》，台北：帕米爾書店，1984，頁 139），確是恰當的形容。從唐代以降，千餘年來中日文化關係密切，《論語》這部經典在德川時代（1600-1868）儒學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日本也保存早已亡佚於中國的《論語》版本。梁代皇侃（488-545）所撰《論語義疏》自著錄於南宋尤延之（1127-1194）的《遂初堂書目》後即亡佚於中國，後由根本武夷在足利學校發現、校刻，再回傳中國，作為「浙江巡撫採進本」而收入於《四庫全書》之中，並收錄於鮑廷博（以文，1728-1814）校的《知不足齋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始廣為中國學界所熟知。清末外交官黃遵憲（公度，1848-1905）有詩云：「論語皇疏久代薪，海神呵護尚如新」（黃遵憲著，實藤惠秀譯：《日本雜事詩》，東京：平凡社，1994，頁 112），所吟咏的就是這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值得書諸竹帛的佳話。《論語》一書在德川二百六十八年間的儒家思想世界中，所經歷的解釋與再解釋，確實值得我們尋幽訪勝。

海峽兩岸漢語學術界對日本思想與文化的研究，與日本學界對中華文化的研究相較，確實極不對等。1884 年（日本明治 17 年，清光緒 10 年），日本學者岡千仞（鹿門，1833-1914）

旅遊中國，曾對李慈銘（1829-1894）說：「我邦學者無不涉中土沿革，而中土學士矇然我邦沿革。譬猶用兵，我瞭敵情，敵矇我情，非中土之得者。」（岡千仞：〈燕京日記〉，卷上，收入《觀光紀游》，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154），百餘年後的今日，這種中日雙方相互瞭解不對等的狀況，基本上並未獲得較大的改善。這部《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撰寫的原初用意，就是希望就中日思想與文化交流史研究略盡棉力。

本書主要的問題意識是：《論語》東傳日本之後，在日本儒者手上經歷何種詮釋之轉折變化？德川《論語》學的變化呈現何種經典解釋學的涵義？上述問題意識固然是我過去三十年來研究《孟子》解釋史時的問題意識的延續，但最主要的仍是來自最近十年間誦讀日本儒者《論語》著作時所獲的啓發。

日本儒者雖與中國儒者一樣啓誦《論語》這部經典，他們雖然也企盼優入聖域，但是他們對於先秦孔門師生對話的內容，常有不同於中國儒者的理解，也因此常提出創新的解釋言論。舉其犖犖大者，孔學中的「道」作何解，東亞儒者所見互異，朱子（晦庵，1130-1200）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伊藤仁齋（維楨，1627-1705）解為：「夫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道」，荻生徂徠（物茂卿，1666-1728）則理解為「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統會於安民」，這種解釋上的轉折變化，極富思想史與經典詮釋學的意趣，我在本書第四、五章中均有詳細探討。德川日本思想家解釋中國經典時，最有創意的見解莫過於他們將中國經典中習見的「中國」一詞解釋為日本，因為他們主張日本得孔子之道與《春秋》之旨（詳本書第二章）。

正是上述這類解釋上的旋乾轉坤甚至偷天換日，多年來深深地吸引我對於德川日本《論語》學的興趣，使我有心於釐清德川儒者解釋《論語》之言論在思想史上的意義，及其對東亞經典解釋學所透露的訊息。近年來，我深感新時代的人文研究，可以採取一個較為寬濶的比較的觀點，以東亞為研究之視野，以經典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既宏觀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東亞各地文化之互動，並在上述脈絡中探討經典中的價值理念之變遷及其展望。在二十一世紀文明對話新時代中，我們更應深入挖掘東亞文化的核心價值，在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上推陳出新，開創新局。

現在這部《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是我五年來探討日本儒學這塊新園地的草創之作。我討論日本儒者對《論語》之詮釋時，常取之而置於東亞儒學視野中，與中韓儒者的《論語》解釋互作比較，既求其同，又求其異，庶幾公正衡定日本《論語》學之特質及其價值。本書初稿承蒙同道學友李明輝教授、張寶三教授以及張崑將教授通讀全書，提示修訂意見，勞思光教授、劉述先教授與楊儒賓教授審閱部份章節初稿，多所指正，惠我良多，衷心感謝。袁永祥先生協助書稿打字排版事宜，謹敬致謝意。學海無涯，綆短汲深，若蒙讀者憫我之用心，匡我之未逮，則幸甚焉。



序於台灣大學
2006年1月28日